

29.01

新城区文史资料

第五辑

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7

目 录

- 渭华起义中我们之一家 侯 建 (1)
民族革命大学始末 马建中 (6)
西北纺织业之先导
——西安大华纱厂 艾 仁 (11)
西安德记铁工厂兴衰记 傅武成 (26)
抗战期间西安的煤油业及
 新华油行 葛晋卿 (30)
西安最早经营进口木料
 的商行 徐恩溥 (36)
西安解放与易俗社 雷震中 (38)
回忆西安市文艺政策讲习会 潘应蓬 (42)
王绍猷与《秦腔记闻》 雷震中 (47)
游艺市场与西安曲艺 武元才 (51)
参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琐忆 隋式棠 (56)
张凤翙密潜山西的前前后后 巍季甫 (60)
张伯英先生在陕二三事 秦仁山 (64)
张子宜先生轶事一则 李镇远 (68)

渭北中学与西安城围	王经如	(71)
新城广场的一次学生“骚动”	马建中	(74)
“七分校”敌后招生纪实	李晶宇	(77)
中原抗战溯忆	杨静仁	(86)
入越受降亲历记	冯殿庆	(91)
沙金案与中正堂	马建中	(97)
“军统”封锁陕甘宁边区简况	冯美铨	(103)
军统局西北地区“电检科”		
点滴	陈祖荫	(113)
“渭北清乡督导团”三月记	贺玉如	(115)
胡宗南的“经济智囊团”	贾忠尚	(130)
国民党中央政校陕西同学会		
活动点滴	胡恩杰	(134)
西安的民乐园	张剑影	(137)
对《孙蔚如与第四集团军宣 传队》的补正	王经如	(139)

渭华起义中我们之一家

侯 健

光阴荏苒，人世沧桑，渭华起义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一九二八年五月，发生在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一次著名的武装斗争。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它震撼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个时候，我虽然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学生，但受革命思想的薰陶和父辈的影响，也曾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斗争洪流。从此，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火种，思想深处萌发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幼芽。

华县的高塘塬，扼渭南、华县、洛南交界之处，地势险要，是起义的根据地之一。那里的高塘和谷堆两所高等小学，是起义的指挥中

心。起义前夕，我的父亲侯明德是高塘镇西南河谷小丘陵上的谷堆小学校长，三叔父侯尚德名义上也是这个学校的兼任教师；二叔父侯崇德是华县教育局的督学。他们三人都是起义的积极分子。当时，谷堆小学的教师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堡子底村三教堂内的县、区委和农协去开会，进行农运工作。我清楚地记得，老师曾多次给我们讲社会科学常识、十月革命的故事和土豪劣绅的罪行；还把我们组织成儿童团，唱革命歌曲，演革命话剧，开展宣传活动。所唱的革命歌曲中，有一首叫《红场歌》，至今我仍能哼上几句：“列宁已逝中山死，……紫京红场并相似。一片红场红复红，照耀世界日方中，……”一次，在高塘会馆戏台前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斗争土豪劣绅，通知儿童团参加。我为了显示自己是儿童团的武装小兵，先一天晚上就哭闹着要母亲给染了一双黄色“裹腿”。第二天，红日高照，我身背大刀，排列在鼓号队后，雄纠纠气昂昂地奔赴会场。人小刀长，跑步时刀尖划破了脚面，血流不止，我忍痛参加大会，并演出了话

剧《歌颂农民》。我们扮成农民，手执锄头，边演边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另外还演出了一幕《老夫子教学》，内容是反对复古读经和封建礼教。

起义号角吹响以后，渭华两塬村村成立苏维埃政府，消灭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斗争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焚契约，分财产，一派革命景象。地方反动当局，曾多次武装镇压，皆被工农红军和农民赤卫队击退。逃亡劣绅及渭、华两县政府急向陕西省主席宋哲元求援。宋亲率国民党军队，分两路进攻渭华起义军。一天清晨，我们谷堆小学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我父亲正在讲课，闻讯跳出教室窗户，从北面悬崖上逃离学校。三叔父急中生智，化装成木匠，身背大锯，边走边罗唣责骂着教员借锯不还，冒险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来不及脱身的老师，多数藏于泥塑神象之后以杂物掩盖。只有几位陷入敌手。此后，反动当局便封闭了这所小学。

宋哲元为了穷追起义军，指挥其部向魏家塬疯狂进攻，与唐澍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和起

义的农民武装，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血战。我当时逃居渭南塬尹家坡外婆家，居高远望，目睹了起义军民与敌英勇斗争的场面。一日激战，众寡悬殊，起义军失败，向牛峪、箭峪口一带撤退，以保存革命力量。

渭华起义失败后，地方反动当局与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卷土重来，在高塘建立了以王佐、李镇山等为首的“清乡团”，并遍设分团，残酷劫洗捕杀起义军民。受害者不计其数。他们在交通要道摆置铡刀，狂吠“那里逮住那里杀。”当时，我父亲及两个叔父逃亡在外，敌人抄封了我家，并声言：“家里有三个共产党员，家长若不都交出来，就没收全部家产，烧光房屋，全家老少一律赶出华县！”我祖父和叔祖父惊恐万状，急忙请客送礼，托人说情，以求宽恕。敌人提出，要“以钱赎罪”：罚款三万银元，还得烧房。如此巨款，一个农家怎能支付得起？经祖父屡屡恳求，兼之邻居怕烧房屋祸及本身，也一起求饶；敌人才放宽了条件：第一，可以不烧房，但要拆毁前屋；第二，至少交罚款三千六百银元。为了保全一家三

十余口性命，两位祖父忍痛粜粮卖地，四处借贷，凑够了三千六百银元罚款，又拆去了前屋，才免遭毒害。

记得敌人查封了我家的当天深夜，叔祖父领着四叔和我，抬着高梯子，从房顶上爬回庭院，用背笼收拾了二叔从北京买回的许多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书籍，拿到牲口圈旁烧毁，以防敌人搜去作为罪证。

家里虽然交了罚款，拆了前屋，但我的父亲后来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派逮去押在西安。幸赖韩望尘先生周旋，才免罹难。

此次浩劫，使我家经济破产，境况日衰。户大家虚，生活维艰，只好析居度日。

民族革命大学始末

马建中

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华北危急，日本侵略军的矛头直指山西。由于已经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驻防山西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遂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由“牺盟会”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亦称新军，开赴前线御敌；并同意筹建民族革命大学，培训抗日后备力量。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之后，日军改变策略，迂回娘子关攻入山西。消息传来，阎锡山慌了手脚，命令傅作义部固守太原，自己却急退临汾。在共产党人薄一波及续范亭等的积极敦促下，一九三八年一月，阎锡山于临汾正式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他自兼“民大”校长，派其外甥、山西省政府委员梁化之为办公室主任，总理学校行政工作；另委杜心源、杜任之分别担任政治处主任和教务处

主任，主持全校的训练与教学。杜心源是共产党员自不待言，担任之也倾向进步，同共产党人多有接触。因此，民族革命大学虽为阎锡山主办，但其训练与教学的大权却操在共产党人手里，实际上是抗日前线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

民族革命大学甫一成立，便有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区的三千多名有志青年慕名而来。一时校本部容纳不下，就又成立了第二、第三分校。由于全民族抗战的感召，全国的许多进步学者、教授，如李公朴、何思敬、施复亮、侯外庐、江隆基、李达、丁玲和张慕陶等，也纷纷应聘任教。当时的临汾，学者云集，人文荟萃，真可谓山西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和抗日的大本营。

但是，目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长趋直入的颓势，驻守在临汾的阎锡山却意志消沉，失去了抗日的信心。上梁不正下梁斜。跟随阎锡山经营山西多年的中上层部属，遂纷纷逃往大后方以图苟安。经薄一波、续范亭等多方努力，才暂时稳住了锡山的阵脚。

民族革命大学开学后，阎锡山看到许多著名学者讲课，学员的学习劲头很足，也对学校一定的支持，先后派了他的许多亲信人物充任行政事务干部。但这些人学无专长，老朽昏庸，对学校工作毫无建树。幸赖负责教学和训练工作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刻苦工作，“民大”的政治、军事和生产技术三个大队才严肃紧张，生机勃勃。据闻，著名学者除张慕陶外，都给学生讲课。薄一波主讲游击战争，施复亮主讲国共合作与抗战的发展，李维实主讲革命哲学，李达主讲政治经济学，李公朴主讲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丁玲主讲抗战文学与组织群众、宣传群众……

提起张慕陶，当时还有这么一段轶闻。张是早期的共产党人，从苏联回国后曾在北平活动多年。因其与时在北平的“华北花王”沈云仙结了婚，便闻名遐迩。他到“民大”以后，同学们纷纷传说其是托派分子。一天，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张慕陶登台讲演，刚一开口，学生们便蜂拥而上，用皮带猛抽乱打。尽管已经鲜血直流，但张慕陶仍侃侃而谈，继续他的演

说。于是，群情更激，一伙学生便从台上将其拉了下来，送至阎锡山部看管。临汾危急，阎部转移时，张慕陶又被送往陕西省保安司令部。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晋中、晋南，阎锡山部抵挡不住，仓惶转移到黄河边缘的吉县。阎本人则过了黄河，在宜川的秋林一带安营扎寨。他竟给这里起名“克难坡”。是时，民族革命大学也迁到吉县。阎锡山严令“民大”不能西渡黄河，全体师生必须沿黄河东岸向北转移。其原因是怕“民大”过了黄河，学生们便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民大”沿河北上，行至八路军控制地区，在多数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才由平渡关过了黄河。当时，学生们纷纷质问教务处主任杜任之：“‘民大’究竟向何处去？杜说：‘现在还不能上课，往哪里去，我要请示阎校长。’四五百多学生，自动去了延安，其余的一千多名学生，由杜任之带领，辗转至宜川、韩城地区。由于原建制已乱，阎锡山命令“民大”缩编为军事、政治两个系，就地开课。一九三八年七月，“民大”第一期学生毕

业。

是时，阎锡山完全失去了抗战胜利的信心，狂吠什么：“不能抬上棺材去抗战”的谬论，变“联共、拥蒋、抗日”为“反共、拥蒋、消极抗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瓦解“新军”，打击进步力量。轰动一时的民族革命大学，由于阎锡山革除了杜任之的教务处长职务而自行解体。

西北纺织业之先导 ——西安大华纱厂

艾 仁

西安大华纱厂，一九三四年秋筹建，一九三六年春正式投产，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是我国西北地区最早的一家现代化纺织企业。

十九世纪末，洋务派的湖北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了机器纺织的工厂纱、布、丝、麻四局。史称“湖北四局”。未几，因经费不足、销路疲滞而被迫停产。一九〇二年，广东商人韦应南的“应昌公司”以二十年的期限承租了湖北四局。应昌公司经营有方，大获其利，一些官僚巨商垂涎三尺。一九一一年，张謇等人以湖北总督瑞徵为后台，组成“大维公司”，中途强租了湖北四局。辛亥革命爆发，事遂搁置。民国成立，“应昌”、“大维”为承租湖

北四局又起纷争。时汉口的德荣号副经理徐荣廷凭借鄂军都督黎元洪之势，与刘伟等人合组“楚兴公司”，插手竞争，“应昌”、“大维”两家败北。一九一三年春，楚兴公司开机生产，业务兴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楚兴”获利巨半，又引起了“将军团”的觊觎。小军阀唐春鹏、石星川组成的“楚安公司”又挤走徐荣廷，取代楚兴公司，承租了湖北四局。

徐荣廷失意后，投资三百万元，以张英甫为经理，于一九二二年在河北石家庄创建了两万四千多枚纱锭的“大兴纺织厂”；又以张松樵为经理，在武汉建了一个四万二千多枚纱锭、五百多台布机的“裕华纺织厂”。这两家纺织厂的董事会设在汉口，董事长是徐荣廷。

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东北。继又越入山海关，将其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各省。伴随着军事侵略，日本的经济势力也接踵渗入上述地区。他们兴办了许多企业，排挤、兼并华人厂商。青岛、天津两大纺织工业基地失陷后，整个华北的纱布市场

就完全控制到日本人手中。这样一来，石家庄大兴纺织厂的产品大量积压，亏损累累，形将倒闭。徐荣廷审时度势，认为西安地处大后方，帝国主义经济势力薄弱，既盛产棉花，又无现代纺织企业，是一个发展民族纺织工业的理想之地。遂于一九三四年秋派石凤翔带领艾衍畴、王友堂等八人来西安筹建大兴第二纺织厂。筹建处设在东大街中段的菊花园街十七号。几经勘察，购买了当时的中正门（今解放门）外，郭上村与八府庄之间的郭家圪台一百二十二亩地皮，作为厂址。由于杨虎城将军的支持、西安各界人士的协助，大兴二厂于一九三五年春破土动工，一九三六年三月开车生产。其机器多从国外进口，在大西北首屈一指。时有资金二百多万元、纱锭一万一千九百六十枚、布机三百二十台。共有工人五百名左右。汉口董事会旋又决定，从武汉裕华纺织厂抽出部分资金投入大兴二厂。遂取“大兴”之“大”，“裕华”之“华”，易厂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亦称大华纱厂。石凤翔任经理兼厂长，徐治平为副经理，技术员张万里为副厂

长。

卢沟桥事变以后，华北及沿海各地相继沦陷，西北地区军需、民用纱布颇为紧张。大华纱厂以其雄厚的资力先后又在川北和关中开办了广元大华纱厂、三原打包厂、维勤纺织制品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白水建华洋灰厂、工矿出版社、西安兴新书店、中国工矿联合产品公司；并在厂内组建了运输队（汽车、马车）、酒精厂、面粉厂、发电厂、肥皂厂、纯碱厂、食盐厂和富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几个小型企业，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综合企业。在其影响下，关中地区先后也建起了申新（宝鸡）、雍兴（蔡家坡）和咸阳等纺织厂，为西北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石凤翔等是纺织工业的行家里手。大华纱厂成立之初就有精干的管理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厂长——工务处——技师（工程师）以下分设纺、织和动力三个部。各部均设主任、技术员——大组长（工头）、保全主任（队长）——雇员。另设试验室，负责工艺、试验、技术；考工科，负责考勤、工资、操